

我看見新天新地了

初音

——讀「一九七四年中國天主教哲學會議記錄」

序 言

稍微關心文化交流的人，也許不難看出當今世界文化交流的「流向」：亞洲各國或各民族向美國學習的成分，大於向歐洲學習的成分；美國向歐洲學習的成分，大於向亞洲學習的成分；歐洲向亞洲學習的成分，大於向美國學習的成分。而且取材與學習的態度也有差別。

一般而言，亞洲人之向美國學習，幾乎是全面而浮泛的。雖然亞洲人大半還保留有某些自尊。例如：臺灣地區的中國人，許多認為我們只是向美國學科技及制度，至於倫理、道德乃至生活的藝術方面，我們仍然比他們強，應該是他們向我們來請教才對。但是明眼深思之士，大概能看出來，我們對他們的科技及制度的學習，並不「認真」；我們對自身的倫理、道德及生活的藝術之自尊，也只是自尊而已。美國之向歐洲學習，除了因歷史淵源的關係，出於懷鄉的情緒，文化來源的追溯之外，便是將西歐人發展出來的學說，拿去改良、實現。他們自稱是人類文明的「大實驗場」。但是，泰半的實驗構想，或發自他們自身，或來自歐洲，絕少取於亞洲的。歐洲人對於美國，在文化上是輸出的，不太認真去理會。歐洲人之向亞洲來學習，則是來掘取我們的歷史

教訓與歷史遺產。例如：法國、德國及英國等，對中國文化的研究，對於印度文化、佛學等的整理。

在態度上，西方人——一般說來——是批判的吸收，認真研究之後，依本位文化的需要，去蕪存菁一番，然後設法溶入他們固有的體系之中。而東方人，除了日本稍稍好些之外，特別是臺灣，若不是全盤的接受，便是任意的取捨。但不論是全盤的接受，或是一筷子一筷子的夾，却總是不認真的、心不甘情不願的。

此種不認真的態度，此種不甘心的被動心理，是文化交流中，常常出現的現象。此種現象往往造成交流的阻礙。此種現象主要的成因是由於敵意。由文化傳統上看來，新的學說一出現，往往先被其敵對者目為荒謬、無意義；之後慢慢的，敵對者發覺它有意義、不荒謬，便會說：「雖然它有意義，但沒有什麼重要性」；等到敵對者不得不承認其重要性時，却反而說，那是他們自己發現的。此種情形如果發生在文化交流上，來自不同文化傳統的新鮮東西，有些人是非在自己傳統中找到它的基礎不會安心的。不幸中國近代一接觸到西方，就有了一連串慘痛的經驗，一般中國人由於歷史的教訓，是難能對洋人沒有敵意的，面對洋人的「玩意兒」，「荒謬、沒意義；有意義，但不重要；重要，但我們祖宗早已經知道」的論調便層出不窮了！所幸我們如今已經好不容易來到了「洋玩意是重要，但我們的祖先早就會了，如果我們努力，我們雖不一定會比他們好，至少也不會不如他們」的階段。往後應該可以滿懷信心的努力下去，不必再為「多餘的屈辱感」所誤。

我們雖然說往後「應該可以」滿懷信心的努力下去，不必再為「多餘的屈辱感」所誤。但是世上「應該」發生而不發生的事情是常有的。因此，我們樂於見到一些促進此一「應該」成為「事實」的努力。

中國文化之與外來文化大規模的接觸，這不是第一次。第一次是與印度文化的接觸。佛教的僧侶居功第一。他們不只介紹理論之功不可沒，在生活方式的引入與發展，更是輝煌。而事實上，文化的交流，學理與生活必要雙管齊下，才能確實，才能開大花、結美果。筆者不能想像如果沒有他們的努力，中印文化的交流，會有已經存在的成績。再說，宗教是人類生活現象中，最為深刻而突出者之一，宗教有了接觸，那交流便很快要演成全面而深入的。如今我們與西洋文化接觸，雖然正逢反宗教、倡科學的世界風潮。但我深信，代表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信仰，不論基督教與天主教，都不斷的勵精圖治，大力的在去除迷信，調合純正的宗教信仰與真正的科學。如果中國基督教信仰界，能在傳教之外，貢獻一部分力量在文化的交流上，其成效是可以指日而待的。而事實上他們早已經開始了。例如去年夏天在輔仁大學召開的「中國天主教哲學會議」便是一個很具體的事件。如今這個會議的記錄，已經發表在輔大哲學研究所出版的「哲學論集」第六期。這是一篇頗為完備的記錄，內容豐富非常，可討論的部分很多。筆者今只摘取個人認為自己能力所及的討論如次。

一、會議的緣起、宗旨及主題

此次的會議是按民國六十一年，在嘉義本篤會之哲學會議的決議辦理的，所以對於中國天主教哲學界應該不是第一次合作。會議的宗旨有二，即：紀念聖多瑪斯逝世七百週年；增進中國天主教哲學教師間之團結合作，交換教學及研究心得。

討論的主題為：聖多瑪斯哲學與中國思想。筆者識淺，對多瑪斯所知不多，但據我所知，西洋哲學中，以士林哲學源流最長，波濤也最壯闊。而它之所以能如此流長壯闊，除了因為天主教會的支持之外，主要的由於它採取開明的保守態度的關係。所謂開明的保守態度是這樣的：當新的學說、新的觀念出現時，它不立刻去接納它們，必要時還反對它們，但明裏暗裏却有一些思

精見深之士去研究它們，等他們徹底弄清楚了之後，再設法將這些新的東西，與舊有的學說加以調合。這不單可以免於急躁的粗淺，還可不斷的修正原來的學說。使適合環境的需要。例如當代科學及當代哲學勃興的當初，它們的許多發現、許多理想、許多觀念，不但難能被天主教哲學界接受，而且很威脅過基督信仰一陣子，教會及士林哲學界明白，此種潮流是無法也不必反抗的。於是便有些人深入科學界，深入當代哲學的各部門去研究，設法努力於原來士林哲學、基督信仰與現代科學及當代哲學的調合，此種調合後的士林哲學，便是所謂的新士林哲學。原來士林哲學的發生，便是為調合基督信仰與希臘哲學而產生的。多瑪斯當時，希臘大哲亞里斯多德的哲學，剛經北非、西班牙傳入歐洲，起初很受天主教的排拒，聖多瑪斯的功績，大部建立在對亞里斯多德哲學的註釋，及對亞里斯多德哲學與原來的天主教哲學之調合。但是他的偉大却不全由於上述的註釋及調合，而是由於他的博大精深，態度的嚴肅與開明，方法的正確與貫徹方法的精神。他這種重邏輯，一步一步的走進自己的見解，再一步一步的走出自己的見解的精神，正是中國哲學最缺乏，最需要補充的。會議的主辦當局——輔仁大學哲學教授團，選「聖多瑪斯哲學與中國思想」做為討論的主題，用意大概也在於闡明多瑪斯此種精神及方法，以應用於中國哲學的研究與發揚。

參考資料是葛慕蘭教授的大文「聖多瑪斯哲學與中國」及輔大哲學研究所出版的「哲學論集」第四期「聖多瑪斯逝世七百週年紀念特刊」。

與會的人士，除了于樞機野聲之外，似乎全是在臺灣各大學及天主教學校執教的哲學教師。臺灣目前有四所哲學系。與會的教授們，在每個學校的哲學系，都擔有哲學課程，他們在平時也認真研究、勤於發表，與青年及社會的接觸也很深入、很廣泛。所以，由他們的相互討論中，我們很可以看出：目前臺灣的哲學現狀，各哲學系的情形，青年人的思想上的需要。附帶的，也能

看出臺灣最有資格談西洋哲學的一羣人物，哲學的素養及熱情度。

二、記錄中的幾則片段

記錄的原文長達一三六頁，而且幾乎首尾一貫、處處精采，筆者只能選重點，點到為止，無法一一探討。

以下所引的幾個片段，都是針鋒相對的。筆者的目的，是想顯出他們認真的態度，絕沒有客套，沒有輕易放過的現象。

(A)……actus 和 potentia，我們翻譯為「行」和「能」，或翻譯為「完成」和「可能」。

(頁八五，羅光教授。)

(A)……有些譯名應該仔細選擇一下，不要一想到就用下去，像 actus 和 potentia，譯成「行」和「能」，都很難應用。……「actus」這個字，其拉丁文是由希臘文來的，原意為實現，而非行動，故翻成「行」是不對的。……(頁一二九，項退結教授。)

(B)聖多瑪斯形上學的中心觀念是「有」(ens)……普通士林哲學講到「有」，是把它當做最抽象的觀念，這一點吉爾松(Gilson)不贊成，吉爾松說，實際上「有」是我們認識時，理智對外界客體的第一個觀念……「有」是我們從一個外界的客體，從一個實際的客體，所得的一個觀念。所以這個觀念，雖說是抽象的，實際上可以說是具體的。(頁八四——八五，羅光教授。)

(B)……無論什麼東西都是 ens……但儘管如此，最具體的東西，就其 ens 的眼光來看，還是普遍的、抽象的。ens 始終是普遍的、抽象的。所以，我不大瞭解 Gilson 說 ens 是具體的，究竟是什麼意思。(頁一二八，項退結教授。)

(C)……西方講的形上學，是在講 Metaphysica。這 Metaphysica，很顯然是研究在

physica 之後——做爲 physica 基礎——的原理。……Metaphysica 我們中國人把它翻譯爲「形上學」。然而，如果我們不把「形上學」的意思……而取其「解釋一切，解釋整個宇宙之意」時……則中國也有一套很好的形上學。但中國的形上學不是 Metaphysica，而是 Metaethica。（頁一三六，張春申教授。）

③……張春申院長提出來的 Metaethica 我不太懂，因爲 ethica 已經是形上學了，爲什麼還需要再來一個 Meta-ethica——如果這個 Meta-ethica 可以成立，那恐怕又需要一個 Meta-Meta-ethica 去解釋它。以後甚至還需要再來一個 Meta-Meta-Meta-ethica。（頁一四四，袁廷棟教授。）

④張春申教授：照項教授您這樣說，一個宗教若講出泛神論的觀點，或甚至佛教他們做出那樣的表達，你是否就能肯定這宗教裏一定沒有 Unio Mystiac。

項退結教授：我不能肯定，但我想，可能性會比較小一點。

張春申教授：爲什麼可能性會小一點呢？這如何解釋？

項退結教授：這與天主的恩寵有關，人本身受限制。

張春申教授：對不起，我不太明白這個解釋。

項退結教授：這一時講不清楚。不過我相信……

像這一類的例子，記錄中處處皆是。另一方面，互相補充各人意見的不是或不完整者，也非常之多。不論別的，光這一點，我們就可以說這一次的會議是成功的：大家認真，不客套，不回避問題。雖然因時間的限制及學養的限制，或問題本身的太過棘手，大半的問題都不了了之，但我們知道，哲學重視的是問題的提出，及討論和探索的過程，研究的態度，而不是急急忙忙的要得到答案或結論。可賀啊！中國學術界能認真的學者已經慢慢多起來了！

三、臺灣哲學界的一斑

此次會議的主題雖然是：聖多瑪斯哲學與中國思想。但與會的教授學者們，大多在臺灣地區從事哲學教育的工作，大家對於現今臺灣各大學的哲學施教情形，乃至整個社會的哲學風氣，都非常關心，言談之中，往往露出關懷及建設性的批評。會中蕭師毅、曾仰如、鄔昆如、張振東及錢志純諸教授，都有專題報告他們所見或所負責的哲學施教的情形。

按諸位教授的報告，目前臺灣四所大學中，四個哲學系，三個哲學研究所，儘管研究的方向各有所偏——輔大、政大偏向西洋哲學、文化學院偏向中國哲學、臺大原來較偏西洋當代哲學，目前則佛學的教授陣容較為可觀——但大致上課程的內容，是以哲學史的教授為主，邏輯學、方法論、社會哲學、政治哲學、美學等非常不受重視。教授的方法，雖然他們很少提到，但在記錄的字裏行間，我們仍然可以看出，大都是教授在臺上演講，學生們在臺下記筆記、讀教本。

學校的圖書設備，除了臺大還算可以之外，輔大有不少最近五、六年新購的書籍之外，政大及文化學院都尚離勉強夠裝門面的距離甚遠。這是不幸的現象，更不幸的現象是，諸位教授都未提及期刊雜誌，恐怕各校對期刊雜誌都不甚重視（筆者的猜測，希望不要不幸而言中）。其實期刊與雜誌是做研究及教學上最爲需要的。沒有期刊、沒有雜誌，或不重視它們，便能顯示出臺灣哲學界仍然急需救濟，不論是資料上，或是研究者的研究態度上。其理由至爲明顯，不必筆者多費筆墨。

至於學生學哲學的熱情不高，轉系的比例高，這是理所當然的。一方面畢業之後，出路幾乎等於零；一方面真能對哲學有興趣，又覺得能獻身的人，畢竟是少數。筆者聽說，鄔昆如教授，剛自德國學成回來，去參加輔大哲學系的迎新會，看見迎新會上有二百學生，訝異的問系主任張振東教授道：「這些學生都是哲學系的學生嗎？新生有多少？」張教授答道：「是的，都是哲學

系的學生，新生是六十名。」鄔教授當場驚呼，嘆為奇觀，原來他在歐洲，哲學系往往只是十數人，甚或小貓三兩隻而已。可是，我們也知道，這衆多的哲學系學生，絕少是有志於哲學的，泰半不是轉系，就是混混而已，畢業後再深入的，恐怕不會比歐洲的比例更高吧！

接着我們引鄔昆如教授與錢志純教授的兩段話，來看看哲學研究所的情形。

「我在臺大慘淡經營了五年，嘗盡了所有酸甜苦辣的東西，比方說在臺大上課，平常在研究所與系裏的課是不分的。所有的先生，凡副教授以上開的課，研究生都可以選，選滿十八個學分就够了。研究所裏面只有一門課『哲學問題討論』，開始時方東美先生開，後來是成中英先生開，成先生當系主任時，人不在臺灣，由我替他開，……開這門課是很困難的，困難是在它是所有哲學課程的全論。我是告訴學生，你下星期輪到你報告時，現在就應該把東西送上來，等東西送上來，他講的是 Wittgenstein 或 Church 一類的東西，我對這些根本沒有興趣，也沒有嘗試，結果還是找書看，總是跟着學生後面跑，弄得很辛苦……」（頁一〇五，鄔昆如教授。）

「有一個課我跟他們每一個人在一起，叫做『哲學問題討論』。這個課我四出去請人來指導。但是好多人都沒有膽子接受。不是真沒有膽子，而應該說沒有時間。譬如以方東美老師為例。去恭請他的時候，我說：無論如何，請一個月光臨一次就好了。但他說：這批年青人，是沒法子一個一個跟他們後面跑的。我說：您不必需要跟他們後面跑，您弄個題目叫他們來研究，您自己也研究一下。但他還是搖頭說：這不是辦法，我沒有時間。這是實情，既然是哲學討論，便可能出現各色各樣的理論來，你幾乎要精通古今中外的各種思想才行，否則必須要有時間進修才行。所以我向他們說，我是來跟他們一起上課的，不是來指導他們：」（頁一一五，錢志純教授。）

老實說，看見這兩段文字，我是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憂。喜的是，我們的學術界，已經出現了老師跟在學生後面跑的情形，也有老師雖不甚樂意跟着跑，却也勉強跟着。也有老師，抱與學生一塊學習的態度。憂的是，我們的研究所仍然是散漫的、主旨不清楚的。試想在師資如此之缺。資料如此之不足，社會如此之需要的情況下，怎能在全所的研究目標上沒有計劃，讓學生「亂跑一氣」呢？這說好聽點是放任、開放、自由。其實是不知學術研究上合作的必要，不明白研究不能完全不顧成效。我生怕常此以往，我們的學術之根，難能紮下。再者教授們似乎尚不願完全放棄擔當「知識的倉庫」的角色，也未充分體悟出，對自己的專業，必須養成學自己不喜歡而必要的東西，而不以為苦的習慣。這點說得重一點，是追求真理者的致命傷。等下面我們見到于野聲樞機的話，便能明白其中道理。

最後，我們得提一提整個社會的哲學風氣。記得今年夏天，在何凡先生家裏，聽「棋王」的作者張系國先生，問一位哲學圈內的朋友！臺灣目前的哲學風氣如何？那位朋友說：一般哲學界之外的青年，仍然像你當年翻譯「沙德的哲學」一書的時候差不多，但似乎比較不容易被潮流帶着跑了。至於哲學界，已經脫離了一味的介紹西洋哲學熱潮的風氣，而轉向比較根本的問題之研究。另一方面，也不會一味的掉弄名辭，自說自話，不理讀者和聽衆的接受能力及態度。說明白些，很注意用辭及表達方式。這一點在會議的記錄中，處處可以得到印證，李震、謝凡等教授都一再的強調。這是相當可喜的現象。

四、聖多瑪斯哲學與中國思想

本來此次會議的主題便是這個，所以大半的討論都圍繞此一主題。但筆者對此甚為外行，不敢下論評。但自一個外行人看來，除了一些專門性的問題，我無法捉摸之外，主要的幾篇講演：羅光教授的「聖多瑪斯哲學對中國可能的貢獻」、高思謙教授的「聖多瑪斯的治學態度」、項退

結教授的「中國思想與多瑪斯的思想可以融合嗎？」、王秀谷教授的「聖多瑪斯思想裏的『一』及在這一方面的一些聯想」、鄔昆如教授「Analogia 這個概念在中國哲學裏的應用」。篇篇都很精采，獨立起來都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論文，討論的也確實針對「聖多瑪斯哲學與中國思想。」

細節我們不論，大體上，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，認為可以將多瑪斯的嚴明系統借來，糾正或補充中國思想的不足，更重要的是要發展聖多瑪斯開放的態度，而不是去死守聖多瑪斯的著作，啃他所應用的名辭，或把他的學說來套中國的傳統哲學。此乃是難得的明智。

不過，既然聖多瑪斯的思想如此之高明，為何中國天主教哲學界，迄今尚未將他的主要著作譯成中文，而呂穆迪譯的，在商務出版的東西，却也不見他們提及。不論理想多好，口號多響，如果不注重基礎工作的，我以為都只是一個「空」。我們張大眼睛，在這兒看，希望不久的將來，此一「空」會被填起來。

五、兩位大主教的高見

此處所謂的大主教，指的是于樞機野聲及羅總主教光。前者是中國天主教教政上的領袖，後者是臺北教區的負責的神長，以他們本身都是出身哲學界，對與會的教授們平時的瞭解，及他們對現實與理想之清楚理會，他們發表的意見，恐怕不只是高明而已，對我們深一層瞭解此次的哲學會議，也會有相當的幫助。

天主教自從在臺北成立輔仁大學之後，因為臺灣哲學界正處在空虛狀態之中，他們在語文的有利情況下，而且有意要把哲學系辦好，所以很快的就在西洋哲學方面建立了小小的聲譽。加上天主教神父們，通通讀過一點哲學，對哲學雖不見得內行，總不會外行到輕視或反對。於是在有重心的情況下，慢慢的就演變出「捨我其誰」的氣概。進一步當然就是行動了。這一點是哲學界的朋友清楚的。大家也希望他們真能真切的做點成績出來。但哲學這東西，做純粹而嚴肅的研究

困難，拿它在做爲其他目的工具，雖不見得成效大，却是學過哲學，而態度不嚴肅者，最樂於從事的。加之天主教會向來拿哲學來固定他們的信仰！此點于主教與羅主教一定看得清楚，所以他們在會中，諄諄表示，要大家多做一點 *Serious Thought* 的工夫，不要想入非非，他們表示，傳教應該以生活爲主，多建些教堂，比搞哲學，效果要大得多。我們今天搞哲學，實在不是爲了傳教，也確不能帶點傳教的心意，而應該紮紮實實地去做研究。于主教說：

「我們要……用平等的眼光去做研究……來提倡中西文化的綜合……研究哲學若無正式科學的基礎，不理會科學的發展，更容易成爲空論，講成神話了，這樣的哲學可真是玄之又玄，想入非非了……不客氣的講，對我國儒家思想的研究有多少，恐怕也是「啞吧喝凉水」——自己知道……外邊的人有的不明白，或出於客氣，說我們怎麼了不起；千萬別弄假成真了，自己不知道天高地厚。……這尚在其次，對西洋哲學，我們又何嘗瞭解多少呢？……今天我們對西洋文化，至多只知道個大略而已。譬如，最近的西方文化運動，有幾人清楚呢？」

「（頁一七四——一七八）」

諸位看看，這是多麼坦白真切之語，又似乎是給他們當頭一盆冷水，其實不是，因爲他老人家接下去說，天主教哲學界，比非天主教界強的只是語文與信仰，語文好是工具好，比非天主教界少一層障礙，有信仰可以不受其他干擾，堅定的努力下去做點有用的真實工夫。

老實說，當我第一次讀這一篇記錄時，我是憂多於喜的，因爲我知道，把哲學交給一羣太熱衷於傳播的人手中，是不幸的。等我認真看到于主教與羅主教上述的高見時，我便安心了，他們的領導人也意識到這一點，他們在此兩位胸襟開闊，識見深遠的領袖關懷之下，一定能有正確的發展的。我們在此預祝也等待他們成功。

六、具體的建議

兩天的討論，大部分時間都在理論上打轉，快到結束時，終於出現了幾個具體的建議：一、設法及建議使各大學多開哲學課，甚至在中學便能開。二、設立專門基金，獎勵翻譯。三、建議合作編一部哲學百科全書。

前兩項涉及較廣，沒有什麼可行的結論是不足為奇的。唯第三項合作編百科全書的事可值討論。請看：

「這兩天的聚會很快就要過去了……以往在意大利舉行的一次哲學會議，結果產生了一部哲學百科全書，現在美國也出了一部。我想，我們可以根據這兩部，也來編出一部哲學百科全書。……」（武長德教授）

「就我所知，現在項退結教授已經開始在翻譯一本哲學辭典，就要出版了。這一本相當新，而且它裏面的東西，觀點也頗為正確。……」（鄔昆如教授）

「也不少，大約有六、七十萬字，以後我們會慢慢再向這條路走。」（鄔昆如教授）

這一段記錄顯出幾項事實：首先，這是一項好的建議，但簡直沒有討論就結束了。這或是與會的諸君，知道此事目前在財力及人力上，尚言之過早。或是大家都不知道工具書的迫切需要。或是大家都沒有熱情做此種吃力的基本工作。其次，一本辭典，特別是哲學辭典，由一個人獨自去翻譯，倒不是字數的多少，而是學養上能否勝任的問題。因為哲學工作者，不可能對古今中外的各種哲學學說及每一用辭都有够水準的了解。我想項教授也清楚此點，我相信他之所以甘冒下十八層地獄之險，定有不得已的苦衷。

七、幾點期望

以上的引述及批評，都只點到為止，實難明確的顯示此次會議的精采。以下提出個人的幾點

期望：

(1)我們樂於看見中國天主教哲學界的逐漸壯大。我們不敢奢望任何一個團體的努力，必須完全放棄團體的要求。所以他們會有意的借哲學教育，助長其信仰之傳播，是可以預料的。但傳播信仰，借助哲學傳播信仰，絕不是不好。只怕如果過分有意，恐怕不但有害哲學的慧命，對於信仰的傳播也害多於利。我們希望，他們能反過來藉着信仰，協助哲學的教學與研究。

(2)我們希望他們因語文的方便，共同的信念，多做于主教所謂的Serious Thought的研究。同時加強合作，多做基礎工作，例如，精選西哲名著，有計劃的翻譯、整理。不要大家都想要做金字塔上的頂石。事實上，當代的中國，正是缺少底層的基石的時候，離放頂石的時候尚遠！

(3)天主教在臺灣有許多學校，關於在中學及大學中推行哲學教育，是最能真正實際去推行的。但據筆者友人所示，即輔大在哲學教育上（指的是哲學系之外的各系），似乎是開了倒車。在臺復校的初期，每一系都得上邏輯學及哲學概論或人生哲學，如今大部分被刪減了！這也許因為課程的限制，或是學生反應不良而做的決定。但學生的反應不良，應該從教師及教材、教法上去改善，而不是刪除課程就行了。原來，諸位教授也一再在會議中，強調中國社會缺乏分析的習慣，邏輯的精神，那麼這些被刪除的課，正是訓練國家未來的主人翁這方面的能力的，如何它反被去除了呢？據聞李震教授曾告訴一位輔大管財政的人說：「老兄，你省錢是對的，但這是教育啊，辦學校如果爲了省一點小錢，而犧牲教育的效果，是本末倒置的！」

(4)最後，讓我們向兩位大主教致敬。我們讚賞他們的真知灼見，相信，在他們的領導之下，中國天主教哲學界，會對中西文化的融會有大貢獻。但我們也希望他們不只是口頭說說就算了，必要時在財力、人力上，多多給這些文化的尖兵支援。

讓我們借用王秀谷教授演講的結尾所引天主教聖經的話做結束吧——「我看見新天新地了！」。